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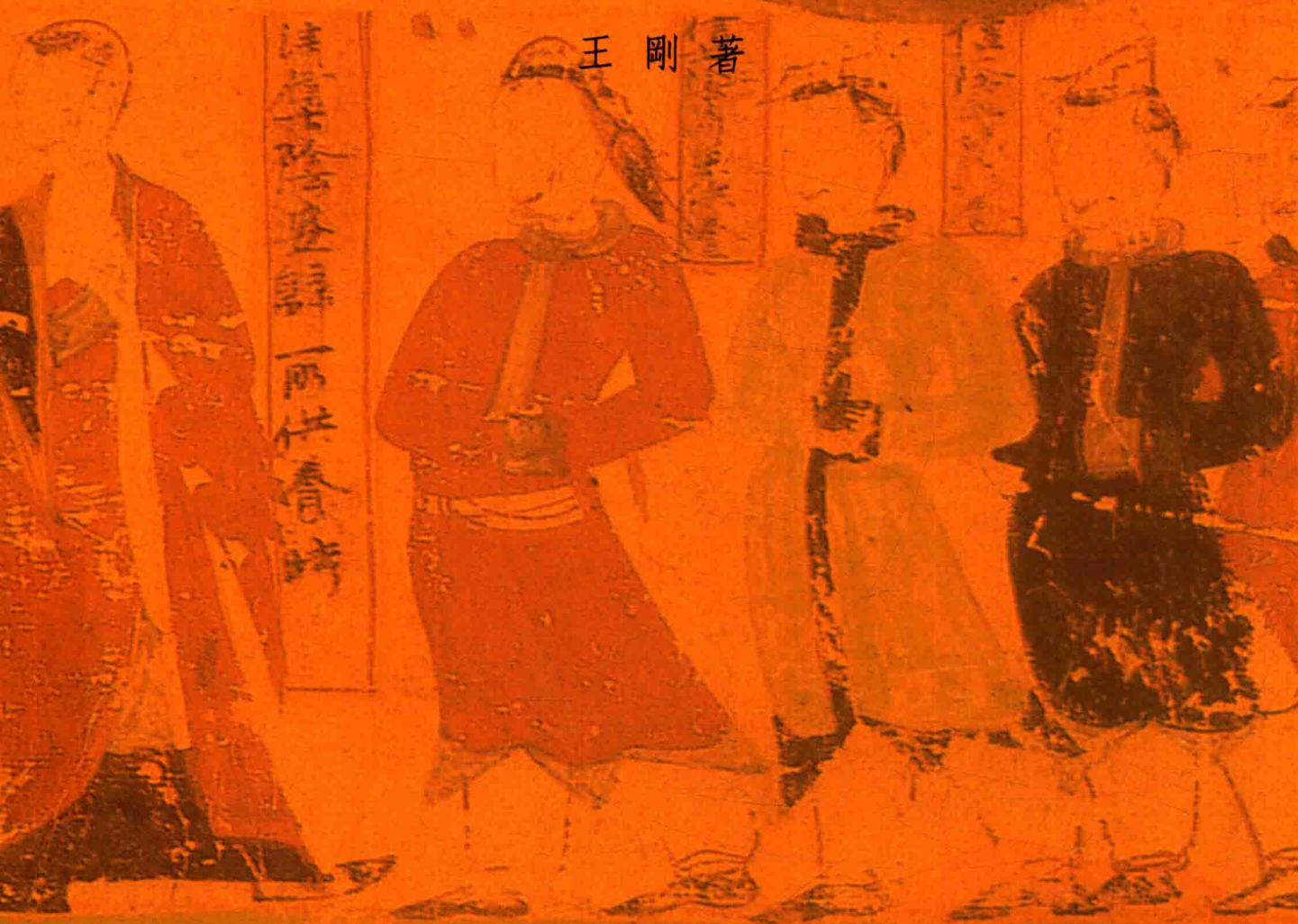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第二冊

秦漢史探微(下)

王剛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王明蓀主編

第2冊

秦漢史探微(下)

王剛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秦漢史探微（下）／王剛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目 4+184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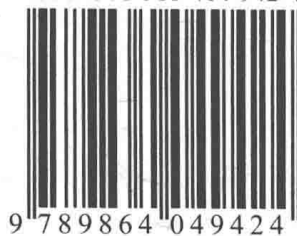
ISBN 978-986-404-942-4（精裝）

1. 秦漢史

618

106001378

ISBN-978-986-404-942-4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冊

ISBN：978-986-404-942-4

秦漢史探微（下）

作 者 王 剛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340150 字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精裝）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秦漢史探微(下)

王 剛 著



目

次

上 冊

秦漢間的政治轉折與相權問題探微	1
一、問題的提出：「大變局」下的宰相及相權問題	1
二、秦漢間宰相地位陞降與事權伸縮	5
三、從「主事」到「主臣」：由秦漢之際的政治看漢相性格的形成	10
四、「功臣政治」下的漢相身份與相權	17
五、結論	23
秦漢假官、守官問題考辨	25
一、假官、守官的基本意義及關係	25
二、秦漢假官的具體性質與官職演進	30
三、秦漢守官的源起、職責與類型問題	39
四、結論與思考	49
試析秦漢重農抑商的幾個問題	57
一、重農抑商的形成過程及其內涵和外延：從西周到秦漢	57
二、為什麼是秦漢？——「重農抑商」中的秦漢個性與影響力	70
（一）秦漢在「重農抑商」政策方面的範式意義	71

(二) 以「農商社會」為參照的秦漢「抑商」 及早期帝國的商品 經濟問題	78
三、「抑商」：古代專制時代的結構性政治經濟矛盾的反映——以秦漢為中心的考察	92
(一)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是「重農抑商」 政策的政治背景——以西漢為例的考察	93
(二) 從一元性權威崇拜與商人的中層擠佔之 間的矛盾看「抑商」	105
(三) 結構性的「均平」、「隔離」指向與抑商 要求	109
(四) 從官僚政治的商品化看抑商	112
四、國家與商人的資源搶奪是秦漢時代採取「重農 抑商」政策的內部原因	114
五、秦漢「重農抑商」的個案考察之一：從西漢黃 金問題看抑商	121
(一) 從西漢混亂的幣制看黃金的貨幣意義	121
(二) 從漢金的地位看政府與商人的斂金行為	124
(三) 資金搶奪與抑商	128
六、秦漢「重農抑商」的個案考察之二：西漢荒政 與抑商	130
(一) 西漢災荒的嚴重後果及同時期政府的 抑商措施	130
(二) 從荒政下西漢政府財政危機的加劇看 抑商	133
(三) 西漢荒政下的商人角色與社會矛盾的 加深	135
七、結語	138
西漢商人身份地位的法律限定	141
一、為什麼是西漢？	141
二、法律限定的一般內容	147
三、西漢商人的分層與身份限定	153
四、市籍問題	161

(一) 性質與範圍	161
(二) 市籍的意義	163
(三) 市籍的功能	165
(四) 市籍的時效性及所涉及的人群	167
五、結論	169
從債務問題看西漢商品經濟狀況	171
一、西漢債務的基本特點	171
二、國家對債務的管理	174
三、西漢商品經濟狀況的探討	179
下 冊	
《史記》的悲劇美	183
一、悲情之人與悲情之書	184
二、從悲情基調到悲劇精神：詩性筆調與歷史文學	193
(一)《史記》與悲劇精神	194
(二) 詩性的歷史敘事與戲劇化描寫	199
三、悲劇美的呈現	205
四、餘論	215
「《春秋》無達辭」的知識生成與董仲舒的《春秋》	
「辭論」	219
一、從董氏《春秋》學的「辭論」問題說起	219
二、「《春秋》無達辭」的文本及相關理論意蘊	223
三、從「辭達而已」到「《春秋》無達辭」	229
四、繼承中的發展：「《春秋》之辭」的知識承接與時代要求	234
五、結論	243
《尚書》學與光武朝政治	247
一、問題的提出：光武朝重《尚書》學	247
二、帝典與受命：漢家正統重建中的《尚書》學	252
三、《尚書》的「稽古」與開新：從「漢家舊制」到「建武故事」	258

四、從《春秋》學到《尚書》學：由太子改立看建武時代的政治轉型	265
五、結語	271
《赤伏符》與劉秀的帝業道路	273
一、前言	273
二、帝業視野下的《赤伏符》本事再考辨	274
三、從「復高祖之業」到「同符高祖」：劉秀集團崛起中的「人謀」與符命	280
四、帝業之固與符命之用：《赤伏符》之修正及再詮釋	286
五、結語	293
赤眉興衰與劉秀帝業創構	295
一、赤眉之亂與更始之敗：劉秀帝業視野下的考察	295
二、河北與關中：赤眉背景下的帝業依託問題	299
三、劉秀帝業之起與赤眉戰略	304
四、結論	310
呂后研究發微——讀史記二則	313
一、《漢書·高后紀》有筆法	313
二、誅殺彭越	317
劉秀史事雜考三則	323
一、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	323
二、光武封更始	329
三、公孫皇帝	330
大庭脩的秦漢史研究方法	333
漢代關稅問題再探討	341
漢代「市租」探論	351
「行錢」辨	361
後記	363

《史記》的悲劇美

眾所周知，史記是一部震爍古今的光輝著作，古往今來，大量學者從不同角度，程度不一地討論其文學與史學價值，為其不同凡響的神韻所傾倒。但一般而言，從文學角度談《史記》，注重的是其文筆和才思；從史學角度談《史記》，則多著眼於其「不虛美，不隱惡」〔註1〕的史家風範。然而，從美學角度討論《史記》的卻相對較少，尤其是從悲劇美學的角度，系統地討論《史記》的則更少。〔註2〕本文擬從這一角度出發，略抒管見，以期達拋磚引玉之效。

〔註1〕《漢書》卷62《司馬遷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2738頁。

〔註2〕國內有一些學者對《史記》的悲劇意識進行過許多有益的探討，如關秀嬌：《論〈史記〉的悲劇精神》（東北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畢業論文），而韓兆琦在《史記通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中則專門有一章節討論太史公及《史記》的悲劇意識；陳桐生的《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多有篇章闡發《史記》的悲劇精神；朱發建的《超越死亡：司馬遷的著史心態》（《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5期）中也有許多文字談到太史公創作中的悲劇色彩，等等。以上諸先生的觀點良有教益，但由於選題及篇幅等諸原因，各位學者多是從悲劇精神，而並非從美學角度明確論述《史記》的悲劇美。此外，馬強在《歷史的審美與詩化——司馬遷歷史美學觀初探》（《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3期），對《史記》的歷史美學作了系統的研討，指出了《史記》以悲為美的問題；而宋嗣廉在其《史記藝術美的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中提出了悲壯美，書中並涉及悲劇美問題；吳汝煜的《論〈史記〉散文的藝術美——兼談司馬遷的審美觀》（載於劉乃和主編：《司馬遷和史記》，北京出版社1987年）一文也從美學角度提到了《史記》的悲壯美，但以上幾位學者由於文章本身的要求，都還未系統地詳論《史記》的悲劇美。

一、悲情之人與悲情之書

關於《史記》的寫作風格，魯迅有一段極為著名的論述，他說：

（司馬遷）恨爲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爲文。〔註3〕

自此，「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幾乎成爲了對《史記》的定評，爲學界所津津樂道。毫無疑問，魯迅的這一斷語是公允而準確的。然而，倘由本論題出發，細加琢磨，筆者不僅要問的是，作爲史學上的一大巨作，《史記》被定性爲「史家之絕唱」，自然是毫無問題，但它又何以能夠被稱之爲「無韻之《離騷》」呢？進一步言之，《史記》與《離騷》之間的相似性在哪？就一般認識來看，藝術成就高固然是重要方面，但筆者以爲，這未必是魯迅的立論核心所在。如循著魯迅的思考及理路向前探尋，《史記》與《離騷》應該是因兩大元素而緊密地聯結在了一起，一是悲，二是情。簡言之，司馬遷與屈原一樣，抒悲憤，寄情於文。在論及屈原時，太史公曾一往情深地說道：「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註4〕可以說，他們的內在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而這種悲與情落實在司馬遷身上，前者主要體現爲「恨爲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後者則反映在「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爲文。」統而言之，是悲情之人所作的悲情之書。

眾所周知，史遷之悲，乃發端於人生的大變故，也就是所謂的「李陵之禍」，這一點太史公本人並不諱言，並引爲終身之痛。在《漢書·司馬遷傳》中錄有他的《報任安書》，其中詳細說明了此事，對自己所遭受的奇恥大辱痛入骨髓，他傾訴道：「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今日讀來，那種難以遏制的悲憤之氣猶然在旁，久久難消。司馬遷的悲情是從身體創傷開始的，然而，身體的殘缺不過是一種外在的表象，由此所帶來的精神折損與掙扎，才是痛苦的內在之源。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明確表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註5〕毫無疑問，太史公所追求的乃是一種精神的存在與不朽，

〔註3〕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外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頁。

〔註4〕《史記》卷84《屈原賈生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503頁。

〔註5〕以下引文不標明出處者，皆出自於《報任安書》。

自己的身體或生命不過是用來實現這一終極目標的載體與形式。所以，當司馬遷領受宮刑之時，他不是爲了苟活而留存殘破的身體，而是需要利用這一工具去實現自己的抱負與理想。他的抱負和理想是什麼？就是爲了完成《史記》這一偉大的著述而奮鬥，所謂「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然而，「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理想不能半途而廢，所以，「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要之，爲了最後的理想，不得不忍辱而活。所以，當專制帝王要奪去他生命的時候，他本可坦然受之，當時咬噬司馬遷之心的，並不在於生死，而是生死之上的精神困境。也正是這種困境所帶來的苦痛及抉擇，使司馬遷的一生都充滿著強烈的心理衝突與怨憤，自此不能擺脫於悲情之外。

就個體的遭際和認識來說，這種悲苦之境首先表現在「孝」及個人價值的實現上。司馬遷是一個重情之人，翻檢《史記》，隨處可見的，是他對弱者及俠義之士的同情與慨歎。有學者據此認爲他有著「強烈的、深刻的人民性」，〔註6〕這其中除了身世上的共鳴，更在於他對情感及正義的推崇，以及連帶而來的，對一般人群的悲憫之情使之然也。而情之首重，在於孝。在《禮記·祭義》中，孔子有言：「立愛自親始。」按照這種理念，一個對世界及世人充滿著情感與愛的人，首先就是愛親人的人，是孝子與孝女，而司馬遷恰恰就是這樣的人。要之，要真正瞭解司馬遷，就應該知道，他對人民的愛，對弱者的同情，是從要做好一個孝子開始的，這是一種儒家之風，後世與此相關的種種階級或泛階級的分析路數，多爲淺薄而牽強之論，與其精神內核並不完全相符。所以，當遭受大禍之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存在與否，而是由此對父母先人所帶來的奇恥大辱，尤其是遭受宮刑，他認爲是極大的侮辱，這種侮辱不僅是自己的，更是父母及家族的，也所以，他才會憂憤而言：「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作爲一名在價值觀上強烈認定「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的士人，在遭逢著「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的殘酷事實時，本可不受其辱，「引決自裁」而去，從而保全一名孝子的最後名節，他曾說：「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那一刻，他是想到過通過結束生命，來履行最後之「義」的。

然而，對於司馬遷來說，受辱固然是不孝，但他無法通過生命的終結，來一了百了，爲人生畫上最後的句號，因爲這樣做的結果，反而可能帶來更

〔註6〕季鎮淮：《司馬遷》，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125頁。

大的不孝。原因在於，《史記》的撰述不是他一人之事，更是家族的光榮與期盼。尤為重要的是，作為父親臨終的囑託，完成這一著述是司馬遷作為人子之孝的本分所在，所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註7〕對於司馬遷來說，可謂進退兩難。怎麼辦？唯有忍辱含垢，為了完成父親的重託，不得不苟活下來，這樣就可以「償前辱之責」，對九泉之下的父親及先人有一個起碼的交代，但不管怎麼說，這份「辱親」之責、之痛，在司馬遷看來，只怕是終身無法洗刷了。故而，當他發出「僕大質已虧缺矣」的哀歎時，就不僅僅是身體殘缺的問題，而是對自己作為人子不能完全盡孝的一種自責。但這種責任最終該由誰來負呢？是司馬遷本人嗎？太史公對此當然是很不服氣的，當「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當慘遭酷刑之時，可謂奇辱疊加著奇冤，在「誰可告愬者」的無助與無奈之下，無消說，他的矛頭直指殘暴昏蠻的君上及主事者，但他又不能明說，由此，憂憤之情只能無可遏制地在胸中噴薄。要之，在無端而至的奇恥大辱之下，司馬遷有著無以言說的憤懣，但首先遇到的精神困境，是孝之難全，由此推演而出的生死之境，存活的意義，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悲與痛。

其次，史公之悲苦更在於，在遭逢身家巨變之時，無一人伸出援手。在孤苦無援之中，所感受到的不僅是人世間的寡情薄義，更有一種生不逢時，無處傾訴，難逢知己的苦痛。當李陵案發生時，他的最終結局並非一定是受刑下獄，非死即宮。按照當時的情勢，司馬遷只要有足夠的錢財加以贖罪，或者有人在當權者面前加以勸慰，都可能出現不一樣的走向。然而，作為「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的司馬遷，沒有錢財的積累，也沒有多少私交甚好之人。事實上，當他為李陵辯言之時，所看到的也正是李陵的「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所以，才斷言：「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雖說的是李陵，但這其中分明就有他自己的影子。毫無疑問，司馬遷不是由於私情，而是完全出於公義，為了國家社稷，以「拳拳之忠」，才向當局建言，孰料竟會遭受如此不測。當大禍來臨之際，「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已然成為定局，但「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才是最為錐心痛骨的事情。固然，司馬遷交遊不廣，是一大劣勢與事實，但倘按照他此前的固定思維，出於公義，當權者應當體會他的這份苦心，而朝堂之上，也應該會有人

〔註7〕《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5頁。

伸出援手。然而，結局卻是深深的絕望。在專制皇權之下，沒有分辯的餘地，也沒有人出手相救，剎那間，在司馬遷眼裏，滿朝皆為冷酷勢利之徒，唯利所在，無一知己，他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孤獨與絕望。

而這樣的悲苦之境發之於情，就滲透到了《史記》的字裏行間，讓他有了別樣的眼光。經李陵一案，太史公看透了世態炎涼，他的內心深處有一私人問題久久難於去除，即：在一個勢利的時代，應如何自處？習文史者皆知，在《史記》中，他作有《貨殖列傳》，對當時的商人群體除了正面的肯定之處，還特別引用諺語道：「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似乎看起來他對於佔有財富頗為推崇，為此班固評述道：「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註8〕其實，班固所見極為表面，太史公不僅不是尊崇勢利之人，而且情形正相反。他是一個極為講求「義利之辨」的人，在他的心目中，「義」總是高於「利」的，所以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一開篇就有這樣的句子：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

也所以，撰作《貨殖列傳》根本不在於「崇勢利」，而恰恰是對那個時代和社會的勢利進行譴責。因而在《史記》中，分明可以看到，司馬遷高度推崇和歌頌孔子、顏回、伯夷、叔齊等為守志而不懼貧賤之人。我們還可注意到，在《史記·汲鄭列傳》中，太史公專門說到一段翟公的故事，身居高位的翟公本門庭若市，但在罷官之後卻門可羅雀，人皆避之，而一旦恢復舊職，賓客們又開始趨之若鶩，《史記》中這樣載道：「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並以「悲夫」二字結束全文。太史公「悲」什麼？「悲」的就是世態炎涼之下的世風，這種世風曾經涼透了他本人的心，在他身體的殘損之上加了重重的一刀。由此，再來看司馬遷的《貨殖列傳》，寫的是「布衣匹夫之人」，屬於「智者有採焉」，〔註9〕他實質上是在告訴我們，在一個勢利的時代，作為無權無勢的布衣，財富的積累是一種「智者」之事，需知當年司馬遷就是因為沒有錢財贖罪，才落得終身隱痛，「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在這裡早已不是空言，而是一種慘痛的教訓。

如果說沒有財富贖身，是一種有形的無助，無人理解，甚至嗤笑自己的

〔註8〕《漢書》卷62《司馬遷傳》，第2738頁。

〔註9〕《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19頁。

遭際，則更是無形的重擊。事發之時，司馬遷曾爲自己作過辯白，可是得到的不僅不是正向回應，反倒是對其忠誠信義的否定，在幾近摧毀之後，所蹦生出的怨憤與絕望，可以想見。我們知道，這樣的苦境在歷史上也曾有人遭逢，並發之於文，傳於後世，此人便是屈原。所以，可注意的是，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太史公不僅給了屈原極高的評價，而且特別指出了《離騷》的成就，與屈原的遭際及怨憤的關係，他說：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倘細加品味這段意味深長的文字，可以說，太史公在對屈原深表同情，對《離騷》極力推崇的同時，又何嘗不是一種心靈的自我傾吐，以及對自己這部《史記》的深深期待與自許呢？也所以，《史記》夠得上「無韻之《離騷》」，就絕不僅僅在於水平和成就上的抗衡，而更多的是屈原精神的推揚。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屈原的詩歌構建了一種新的美學樣式，它來源並發揚了《詩經》精神，將憂憤之情發之於詩文，聶石樵說，這屬於「發憤以抒情」，而這一路數到了司馬遷這裡，則更爲自覺與「理論化了」。要之，由《詩經》而屈原，再到司馬遷，從美學角度來看，生成的是「具有強烈的怨憤情緒的悲劇。」〔註10〕由此，完全可以說，從《離騷》到《史記》，它們乃是先後相續，同具悲劇之美的偉大作品，皆爲傳頌千古的「怨憤之作」。

而就本論題出發，聚焦於司馬遷，又可注意的是，太史公之「憤」，在其內心感受中，特別強調的是揮之不去的孤獨，即所謂的「孤憤」。當然，這一點在屈原身上早已存在，所以才會有「眾人皆醉而我獨醒」〔註11〕之感慨，但「孤憤」在司馬遷的那裏表現得更爲自覺與外顯，並在慘痛的代價下，與「說難」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

習文史者皆知，「說難」主要指的是，在闡明自己的觀點時，要爲人信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與「孤憤」一樣，不僅是某種精神狀態的闡述，更是《韓非子》中的兩部名篇。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司馬貞《索隱》曰：「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韓非子是否「孤直」，本文不加論述。但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司馬遷對韓非的評價很值得玩味。他一

〔註10〕 聶石樵：《屈原論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212、213頁。

〔註11〕 《史記》卷84《屈原賈生列傳》，第2486頁。

方面對「其極慘礫少恩」進行了評定，另一方面，又對韓非多作正面陳述，幾乎沒有貶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價值認同來說，「慘礫少恩」之人本為司馬遷不喜，除了本人的性格，宮刑中所領受的人情淡寡，應更為加重了這一感受。所以可注意到，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對同為法家代表的商鞅大為伐撻，焦點就在於其「刻薄」、「少恩」，而這種狀況在韓非子的性格及理論中，是不遑多讓的，太史公避而言之實為異數。筆者以為，此種狀態的出現，很大可能在於，韓非的遭際及處境與太史公有相通之處，故而，行文之下的重點竟在於「說難」、「孤憤」，從而迴避了他刻薄寡恩的一面，這就使得不僅在《報任安書》中，有了「韓非囚秦，《說難》、《孤憤》」的句子，韓非由此成為了聖賢「發憤」的一個代表，也使得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出現了「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的感慨。細繹文字，太史公「獨悲」於韓非的無力自我辯說，實質上是同樣的際遇敲打著自己的心靈，由此大為慨歎。所以在《報任安書》中，他說到：「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這不正是又一種「說難」嗎？而「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誰可告愬者？」不也正是「孤憤」之情的強烈宣泄嗎？

總之，宮刑不僅對司馬遷的身體，更對其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巨辱與巨變之後，悲情氛圍就此纏繞著他的一生，也為《史記》的撰作鋪陳了濃重的悲情底色。毫無疑問，李陵案及由此所帶來的宮刑之辱，是司馬遷心中的永久傷痛，但更為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司馬遷並沒有消沉，撰作《史記》成為了他存活的意義與精神支撐，他說：「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在他看來，他的生命已完全寄託於這部傳世之作中，只有完成了這部作品，才能在心理上得到部份的補償。由此再來看司馬遷，在創作過程中，感懷於心的憤憤之氣，悲愴之情，免不了要流於筆端，《史記》成為抒憤之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宮刑激發了司馬遷的內在悲情，成為其抗爭的起點，表現於《史記》之中，情感濃烈下少有四平八穩的官樣描述，激越的情緒下總是呈現出別樣的悲戚之美。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史記》遠不能作一般的史書去解讀與看待，也所以魯迅才會說：「惟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從特定視角去解讀，其實質在於，史遷是在以史事及人物澆胸中塊壘，將自己的情感投射於

此，《史記》由此以事寄情，以情見美。也由此，《史記》就化爲了一本飽含著情與美的書。

顧炎武曾說：「《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註 12〕如移之於本論題，實在可說：「《史記》於序事中寓悲情。」而毫不誇張地說，也正是在這種悲苦的吶喊與抗爭中，《史記》最終得以生成，它是一部浸潤著太史公個人情感的書。《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毫無疑問，不理解太史公慘痛的經歷與內心世界，就不可能真正讀懂《史記》，讀懂司馬遷。但更重要的是，太史公那別樣的抗議與感懷，雖然緊緊聯結著個人的遭際與苦痛，但這並不是完整的司馬遷。進一步言之，他的悲情屬於個人，更超越了個人，「知人論世」之際，更應看到那個時代對司馬遷的心靈塑形，及他本人對時代的超越。在這樣的理路下再去看《史記》和司馬遷，就可以說，這種悲情不僅僅屬於他本人及其書，更有著深深的時代印記，並且始終伴隨著這一偉大人物對精神藩籬的衝撞、突破與超越。

由前已知，司馬遷的悲情，起點在於殘酷的刑法，直接對立面就是漢朝廷及其最高代表——漢武帝。毋庸諱言，對於本朝的統治者，司馬遷發了不少的怨言，雖今天看來，很多都是正當合理的，但自漢以來，卻很有一部份人抱著狹隘的私人態度去看太史公，認爲是私怨使得他寫出了那些文字，遂有了所謂的「謗書」之說。這種說法，筆者是絕不敢苟同的，倘以這樣的態度去看待司馬遷及《史記》，那豈不成了市井小兒的罵街之作？他及它所擁有的崇高地位將從何談起？所以，這樣的觀點不是有著別樣的目標及用心，就是見識短淺。需知在太史公心中，「公義」遠重於私怨，他曾明確表示，他的「悲」乃出於「公」，而非私情，所謂：「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註 13〕在這一問題上，筆者完全同意陳桐生的意見，他指出：

「謗書」說的要害在於貶低了司馬遷的人格品質，把《史記》極爲嚴肅的主題降低到泄私憤的水平，它忽視了司馬遷深沉的人類責任感及其宗教擔當精神，它無視《史記》崇高的文化目標，因而是對《史記》主題的嚴重歪曲。〔註 14〕

〔註 12〕 顧炎武：《日知錄》卷 26《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秦克誠點校：《日知錄集釋》，嶽麓書社，1994 年，第 891 頁。

〔註 13〕 司馬遷：《悲士不遇賦》，嚴可均輯：《全漢文》，商務印書館，1999 年，第 266 頁。

〔註 14〕 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 年，第 283 頁。

要之，司馬遷的理想與抱負是宏遠的；《史記》的主題是深沉的，是一部超越個人情懷的「古今天人」之作。所以當太史公宣稱：「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之時，他的悲情中已飽含了文化的含量與歷史的超越，而絕不是僅糾纏於身世之間，作小女子之悲切，發閨怨式嘶喊。由此，太史公之悲情，就化爲了一種文化與歷史的悲情，是在時代之軛下，左衝右突，尋找出路的悲與情。

在《報任安書》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論述，集中闡釋了司馬遷作《史記》的思想情懷與文化寄託，其文曰：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拘文王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細繹文字，結合本論題，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1、司馬遷以承接前賢而自況，並以文王、孔子爲引領，而所謂「思垂空文以自見」，本是《春秋》的特點，〔註15〕用在這裡，明顯是以承接孔子的道統而自居，並直接關聯著《史記》的自我定位。翻檢《史記·太史公自序》，可以看到，不僅是司馬遷本人，甚至其父司馬談的遺命，都是希望能通過作《史記》，而接續《春秋》。那麼，《春秋》是什麼地位呢？在漢人看來，它是政治及意識形態的最高指導書，《論衡·須頌》所謂的「《春秋》爲漢制法」，在那時已成爲一種公認的思想。所以，當司馬氏父子立下接續《春秋》之志時，無疑是對先賢，尤其是孔子文化道統的一種承接，這一點在司馬遷身上表現得更爲明顯與突出。我們注意到，自先秦士人傳統確立以來，「弘道」已成爲每一個具有文化責任者的當然選擇，司馬遷不僅不例外，而且有著一股舍我其誰的氣概。所以，《論語·泰伯》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衛靈公》篇又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司馬遷才會有「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意在斯乎！意在斯

〔註15〕《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